

抗战时期

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研究

KANG ZHAN SHI QI XI BEI JING JI KAI FA
SI XIANG YAN JIU

杨红伟 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3069517

抗战时期 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研究

KANG ZHAN SHI QI XI BEI JING JI KAI FA
SI XIANG YAN JIU

杨红伟 〇 著



F092.7
17

F092.7
17



北航

C167841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研究/杨红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161-2926-5

I. ①抗… II. ①杨… III. ①经济思想—思想史—西北地区—1937~1945 IV. ①F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4798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武 云
特约编辑 段 珩
责任校对 姚 颖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 / 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45千字
定 价 45.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导致时代思潮飞流激荡，层出迭见。在时代风云的变换之中，一股西北开发思想时隐时现。它初起于经世思潮之西北史地学派，辗转依附于洋务思潮、维新思潮、革命思潮之中，甚至一度成为军阀混战相互标榜的口号，然而最终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在中国面临空前大危机的时代背景中，涓流奔腾，轰然汇为江河，演变成一股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社会思潮。

然而，随着抗战胜利，西北开发思潮逐渐潮落，遂不引人注目。即便是在学术界内，治思想史者，或偏于近代以来政治思潮，或重于学术思潮，多未将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纳入研究视域之中；在抗战史的研究中，西北开发思潮更是或为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或为精致的战争史之深描而屏蔽。因而对于这场曾经声势浩大的思想运动，为史者却应之寥寥，而将其视为独立社会思潮者更是少之又少。

红伟就是这少数人中，较早从事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想研究，并从思想史的角度将其定义为思潮进行详细论证的人。1994年，红伟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从中原来到大西北，学习、工作，已历时十八载。大二时，我给他们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不过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接触。红伟在大四上半学期时，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本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我忝为其导师，开始有了密切的交往。红伟脑子活，涉猎广泛，善于钻研，发现问题；身体又好，有钻劲，有冲劲，稍加点拨，即可触类旁通，很快就掌握了独立科研的能力。红伟从研究生阶段开始，一头扎进西北区域史研究领域，孜孜以求，不馁不倦，从着手近代甘肃留学教育研究，到聚焦于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研究，再到现在藏传佛教与安多藏区社会的研究，总能填补一些

学术研究上的空白点。其中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研究，红伟用力尤著，大量收集资料，认真研读，并与近代西北开发史相联系，用功精勤，可谓不易。不过人生境遇，有一帆风顺之时，也有遭遇挫折之际。方当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研究即将杀青，一次失窃事件，导致红伟多年的努力，尽遭贼手。闻之令人扼腕！

2004年后，红伟鉴于西北区域社会多民族、多宗教的特点，为获致对西北区域社会的深入认识，在本校王希隆教授门下，攻读民族学博士学位，专门研究藏传佛教与安多藏区社会，无论研究水平，还是对西北区域史的认识，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成果。2008年，红伟甫以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循化藏区权力机制的文化考察》顺利通过答辩，即着手《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研究》的写作，可见其在学术研究上坚韧不拔之精神。值此书即将付梓之际，红伟向我索序，有感于此，不能不为之。

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是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近代中国百余年间，仁人志士对西北经济开发所给予审视与思考的顶峰。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起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既是国人对国难日亟的反应，担心西北为东北之赍续；也是寄希望于通过西北的开发，为救亡图存的抗战奠定精神与物质之基础。因而，人们高扬西北的历史文化价值、国防价值与经济价值，并探寻使其价值得以挖掘、利用与发挥的途径与方式。与此同时，国人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不仅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也明白了无现代化即无以独立富强的道理。两股思想在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中汇流，互相激荡，既弹出了时代的强音，也造就了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转型，使之呈现出与传统西北开发思想截然不同之处。

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作为一个时代的呼声，既有对传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继承，也有现代性的转向，推陈出新。新旧杂陈中，众多开发主张蜂起，从移民垦殖、发展交通、恢复农业、兴办水利、推进工业，到建设生态农业经济、发动工业化、实现经济现代化，一条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新陈代谢脉络清晰可见。红伟紧扣这条脉络，完成了一项具有前瞻性与前沿性的学术课题。本书对以往的研究有四点突破：一是全面论述了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不仅梳理了近代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历史流变，还从开发价值、开发目标、开发战略、开发布局、开发步骤以及开发措施等，多层

级、系统地勾勒了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轮廓，展现了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中以往被忽视的一些鲜明的特点与亮点；二是注意到社会的系统性，将经济领域视为镶嵌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部分，从国家政治制度、地方吏治、民族关系以及交通、教育、金融等多方面探寻西北开发的障碍与先决条件；三是深入挖掘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现代性内容，如生态农业建设、水土保持、工业化等在西北经济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具有较强的现实参考价值；四是专门介绍了抗战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开发思想，从西北区域社会即民族社会的角度而言，或不应辟为专论，然这些主张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新民族主义语境之下，不仅涉及对西北少数民族认识的重要转变，所提出的某些开发原则鞭辟入里，更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时代性与实践性，也造成了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但却是中国人对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一次重要探索。红伟对此所做的审视，充分表明作为一个历史学工作者，应该拥有的辩证思考能力与强烈的历史感。

红伟生性耿介，快人快语，做事雷厉风行。故在为学之上，心无旁骛、不懈不怠、冲劲十足，犹如学术战场上的冲锋队员，因而在清扫战场上就显得有些粗枝大叶，在一些细节上处理得不够精确。一如本书，虽然在立论、分析、阐发等方面，俱有可圈可点的闪光之处，但内容的安排与联系上仍有可商榷的地方，文字表述虽然顺达、明确，也有可进一步洗练、明快的余地。虽说这是年轻学人常有的毛病，还是期望他能够更加练达，在学术研究上向着圆融之境迈进。

几经周折，终于可以看到红伟这本书就要出版，不由替他感到高兴，也借此机会谈谈个人的一些想法和感受，希望能对他学海扬帆有所助益。

是为序。

王劲

2013年1月20日于西雅图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定位	1
第一节 “开发”与“经济开发”	1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两大主题	8
第三节 西北的空间范畴	16
第四节 角色错位与西北开发	23
第五节 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与经济开发思想	29
第六节 研究概论与结构安排	35
第二章 抗战时期的西北影像	42
第一节 西北落后的影像	42
第二节 西北潜在的开发价值	57
第三节 西北开发的障碍与先决条件	68
第三章 西北经济开发的目标与途径	82
第一节 开发的目标与基本战略	82
第二节 开发的战略布局与战略步骤	95
第三节 国民政府西北开发的基本方针	108

第四章	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现代转型	120
第一节	农村经济开发思想的现代转向	120
第二节	走工业化的新路	137
第五章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开发蓝图	154
第一节	西北少数民族的分布与特点	154
第二节	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的目标与原则	166
第三节	民族地区经济开发思想的现代转型	178
第六章	世纪回响：检讨与启示	189
第一节	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特点	189
第二节	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检讨	200
第三节	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理论贡献	209
后 记		221

第一章 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定位

经济开发思想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对某一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所拥有资源做出评估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经济开发目标定位、开发步骤设计以及具体开发措施等思想主张的综合体。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是在近代中国两大时代主题的驱动下,经由晚清与民国初期西北开发思想的演变,至抗战时期而汇聚成的一种带有区域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转型色彩的经济开发思想。它溶函于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之中,既体现了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的价值追求,也具有自身一定程度上的独特内涵。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产生,处于近代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认识水平,都带有时代所赋予的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渡性色彩。这些在民族忧患意识之下,继承传统开发思想之精华并经由西方现代学理之滋养,深沉思虑的智慧结晶,也许在今天看来还略显事物初起时期的粗疏与幼稚,但却代表着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思维的道路。尤其重要的是,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不在于曾经提出了哪些仍然可以为今所用的主张,而在于它开启了我们今天仍然不得不在其中思考的问题框架。

第一节 “开发”与“经济开发”

近些年来,“开发”一词的使用越来越广泛,频度越来越高。然而,对这一概念性术语的使用还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并因缺乏深入的讨论,使其基本范畴没有得到明确而通行的界定。以往研究对“开发”的定义主要有三

个。刘与任首先从国土资源的开发方面做了这样的阐释：“开发——是指至今尚未发挥或发挥得很不好的国土使其开始发挥它们的重大功能。”^①魏永理从开发史的角度认为：“何谓开发史？凡是人们为自身生存和改善生存条件对自然和社会所进行的一切斗争或改造活动均属于开发性活动，而这种活动的延续就是开发史。”^②聂华林与徐创凤则认为：“开发从本来意义上讲，是反映人们在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开拓、创新活动。人们超出原有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范围，开辟新的生产领域，加工或改造新的劳动对象，创造出新的或更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使其开发对象将尚未发挥或发挥得很不好的功能充分或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我们认为，这些就是开发概念的本来含义。”又说：“开发就是人们把各种资源、条件、潜在因素转化为具有特定效用的物品、精神产品或现实过程、现实关系的创新活动。”^③

上述三个定义可以分为两类：魏永理强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开发，既包括经济开发也包括其他社会领域的开发，即使在经济领域内也暗含着两类开发目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刘与任、聂华林与徐创凤眼中的“开发”就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开发，开发的目的是发展经济，因为他们所强调的是使国民经济中的基要函数关系发生变化。由此造成他们对“开发”属性的认知差异，前者将“开发”等同于“劳动”、“生产”，后者将“开发”等同于“创新”。

对“开发”理解上的差异不仅存在于学术界，在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理解更是屡见不鲜。如果说，作为日常用语，“开发”一词的基本含义可以因大众的心领神会大昌其道；但作为一个分析性学术概念，就必须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体现其内在的规定性内容，否则若将“开发”等同于“劳动”、“生产”或等同于“创新”，那么“开发”词语本身意义何在？正如马克斯·韦伯论及如何给政治团体下定义时所言：

不可能通过指明其团体行为的目的来给一个政治团体——包括国家——下定义。从粮食供应到艺术保护，无不是各种政治团体偶尔追随的目的，从个人的安全保障到司法，无一不是一切政治团体追随的目的。

① 刘与任：《国土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② 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前言》，载魏永理主编《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③ 聂华林、徐创凤：《开发经济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的。因此,人们只能通过——在有些情况下,上升为自我目的的——手段来给一个团体的“政治”性质下定义,这种手段并非唯它独有,然而对它很特殊,对它的本质是不可或缺:暴力。这并不十分符合语言的习惯用法,然而习惯用法没有精确化是不能用的。^①

同样,我们既不能简单地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目的性作为定义“开发”的唯一属性,也不能因为“开发”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兼具创新性、生产性与劳动性的活动而将其混为一谈,必须要在它们相互区别中看到“开发”独具或不可或缺的因素。为此,就需要我们回溯历史,为“开发”一词考镜源流、正本清源,全面了解其本身所具有的知识体系。

回到中国传统文献中,“开发”具有以下几种含义:

(1) 通过实施有效的政策而达到国内政治稳定、民生和谐。《周易口义》卷一:“居公相之位,内总百揆,外统九州牧伯;而又作乐以兴天下之和,制礼以正天下之序,施刑以惩天下之恶,为政以正天下之治。是皆内含章美之道,以通畅于四支,开发天下之事业。如此是文明章美之极致者也。”

(2) 通过实施教育,启迪心智而明晓事理。《周易口义》卷二:“蒙昧之人,其性不通,其志不明,必得贤明之人,举其大端以开发之,则心志稍通。通而不已,遂至大通。”《周易衍义》卷二:“故蒙有开达之理,得先觉者开发之。”

(3) 舒展、生发。《易学记》卷四下:“时之大,天地之气开发,交感而和畅,则成雷雨,雷雨作则万物皆生发。”

(4) 打开、开启、开挖。《五礼通考》卷二四十六:“去年亢阳,关内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于赤子,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廩,普加赈赐。”《南史》卷六十五:“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开发冢墓,出游田野,必与偕行。”

(5) 通过垦殖、开采等方法来充分利用荒地或自然资源。《前汉书》卷七十七:“时帝舅红阳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略皆开发,上书愿以入县官。”《元和郡县志》卷三十:“石鱼山,其石色若云母,开发一重石,若鱼形刻画,烧之,作鱼膏臭。”

(6) 发现、阐扬、发展。《文忠集》卷一百八十:“博取诸儒之说以

① [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3页。

合经旨，用力至矣。连日细读，开发为多。佳篇长短，句又皆规模，前辈未尝苟作。”

由是可见，“开发”一词有“显”、“通”、“完善”之意，即通过特定的手段使事物所本有的“隐”、“潜”之能与性状得到认识、发挥作用。所以有待开发的对象必须具有“有用”的本质，并以得到认识为前提，开发即为使“有用性”得到发挥和利用。因而所谓开发之道就在于使“能而未启”得到彰显和发扬，故《格物通》卷五十八云：“五者之理出于人心之本然，非假外求。惟教学不明则无以开发其良心，故不相亲，不相顺教者也。所以开发其良心而复其本然之理也。”如果根本不具备“有用性”的前提，也就不具备开发之可能性与价值，所以《杨忠介集》卷五云：“孔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盖君子能立志向学，必要做好事，必要习好人，一切流俗所尚，皆不屑为。故心路开发，一日明似一日，一日高似一日，未有不上达者也。小人不肯学好，溺于流俗不自振拔，故一日卑似一日，一日昏似一日，未有不下达也。”

根据“能”得到利用的程度，“有用性”的大小优劣，也存在是否需要开发以及开发难易之别。《性理大全》卷三十一即依“气”的清浊及“赋质”的纯粹程度将人划分为五类，依次进行了探讨：

如圣人得气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赋质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大抵得气之清者，不隔蔽义理，便呈露昭著，如银盏中满贮清水，自透见盏底银花子甚分明，若未尝有水。然贤人得清气多而浊气少，清中微有些渣滓止，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聪明也，易开发。自大贤而下，或清浊相半，或清底少浊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盏底银花子看不见，欲见得须十分加澄之功，若能力学也，解变化气质，转昏为明。有一般人禀气清明，于义理上尽看得出，而行为不笃，多般诡谲，是又赋质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贮在银盏里面亦透底清澈，但泉脉从淤土恶木根中穿过来，味不纯甘。以之煮白米则成赤饭，烹茶则酸涩，是有恶味夹杂了。又有一般人生下来于世味一切简淡所为甚纯正，但与说道理处，全发不来，是又赋质纯粹而禀气不清。此如井泉脉味纯甘绝佳而有泥土混浊了，终不透莹。又有一般人，甚好说道理，只是执拗自立一家意见，是禀气清中被一条戾气来冲拗了。如泉出来甚清，却被一条别水

横冲破了，及遭巉岩石头横截冲激不贴顺去，反成险恶之流。

可见，就人的心智而言，需要开发与否及开发之难易，存在一个先验或理想中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圣人之“气”与“赋质”。在等级序列中，越是靠近圣人之标准的开发就越容易，反之则较难，而圣人则是不需要开发的。

在英语中，作为名词与“开发”相对应的是development，其最基本的含义即the act of developing or the process of being developed。^①很显然，其基本词义由develop与developed做了根本的规定，暗含了被开发的对象具有欠发达、落后、不成熟、规模较小等内在特点——这些都是根据所谓的developed来衡量的——只有通过develop过程才能使被开发对象经由developing的状态逐渐进入到developed的状态。所以，开发就是指一系列行为及由这些行为所构成的一个渐进的历史进程。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开发”一词所包含的基本要素进行简要归纳：（1）被开发的对象总是根据某些先验的或理想的标准被认为是落后的、不成熟的、不完善的或欠发达的，同时由于历史的连续性，这些标准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2）某类事物之所以被视为开发的对象是因为被认为蕴含有用性，具有潜在的价值；（3）开发的目的在于使被开发对象“未启之能”得到发挥，达到完善与和谐；（4）开发的手段在于通过精心的设计，借鉴已有的经验或创造性活动，去粗取精，发挥优势，达到质的提升与量的增加；（5）开发本质上是一个具有针对性的改造行为和改造过程。由此，我们认为所谓“开发”就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借鉴已有的经验或创造性活动，针对那些根据某些标准而被视为有用但未得到有效利用的对象物采取相应的手段，从而使之逐渐臻于成熟、增强效能、建构和谐关系的行为及其历史进程。

因而，所谓经济开发就是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针对欠发达地区，通过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或者创新性活动，采取相应的措施或手段使未得到利用或利用得不好的资源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经济价值，实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目标，获致经济发达之目的行为、活动及其历史进程。

在这一框架下，经济开发的对象为经济欠发达地区，而欠发达判定的

① 《朗文当代英语词典》，朗文出版公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80页。

标准并非恒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因为参照系的变化以及在同一历史阶段比较对象的不同,被称为欠发达的区域也就不同。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往往将基本经济区视为经济发达地区,将周边地区或偏远地区视为欠发达地区;而近代以来,将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标准,整个中国就是欠发达的,属于要开发的地区,所以即使在东南沿海亦普遍设有经济开发区;而与东南沿海相比较,西北地区同样被视为经济欠发达地区,需要整体上的经济开发。然而并非所有的欠发达地区都可以成为开发的对象,事实上一旦某个区域被作为开发的对象,已经暗含着一种认知:该区域存在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只是因为固有的资源未得到利用或充分的利用,从而导致经济的欠发达;这种有利于经济的因素只要得到应有的利用,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或发展的机制就会生成,就有可能实现赶超目标。

经济开发的二元规定性,使经济发达区域不可避免地成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学习的对象,造成技术转移以及为支持这种转移所需的制度与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转移在人类整体的认识上并不意味着进步,然而对欠发达地区来说却是一种新的手段。它不仅意味着资源类型学谱系将会获得增加,同时还意味着这些资源将会得到充分的开发以及延展它们被利用的广度与深度,甚至突破资源限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瓶颈。当然,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并不排斥创新。所谓创新,暗含着两种含义:一是在技术转移基础上的技术创新,这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当然并非所有的开发都存在创新;二是制度创新。后一点对于经济开发来说至关重要,毕竟“由资源禀赋和技术组成的经济子系统的生产力是以社会中的文化和制度为条件的”^①。

经济开发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决定了它与其他类型的开发具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虽然参与开发的主体存在多层次性,但必须由政府主导。如南北朝时期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如果没有国家在产权界定与保护以及相应的赋税豁免政策激励,很难取得成效;而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北地区的开发,除了引入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及其配套的生产工具外,还建立了相应的屯田制度。近代以来,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上作用的逐渐确立,并日益发挥主导作用,对政府加大制度供给力度以减少外部性,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市场功能的需求也就逐渐增强。同时,市场运作机制的发挥,还受制于信息

^① [日]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的不对称及交通的不通畅等因素,这就使政府不仅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还必须为经济开发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此外,欠发达地区资金积累比较低,也需要政府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经济开发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从贫困到富裕的转变,然而日常经验可观察到的则是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正如吉利斯等人所强调:“‘经济增长’说的是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和产出的增长。如果一个国家的商品和服务增加了,不管在什么意义上,都可以把这一提高看成为‘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含义则更广泛。”^①经济增长主要用来度量经济变量的增长及其相互关系,含有数量扩张的含义,并不意味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国民经济基要函数关系会产生连续的变化。经济发展甚至不只是经济学问题,不仅包括人均收入的提高与经济结构的变化,还包括诸如制度、组织和文化等非可量化因素变化的过程。所以迈克尔·托达罗指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的过程。”^②并进一步认为发展的核心价值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生存、自尊和自由。所以就经济开发的目标来说,首先应该是实现经济的发展,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受当时认识水平、文化以及社会体制的束缚,人为设定的开发目标并不必然符合这种理性的、基于公平之价值判定的目标,往往只是停留在经济增长的层面上。一般说来,在传统社会中,经济开发的目的在于经济增长;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开发的目标则逐渐转向了经济发展。

在比照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基础上,还必须制定相应的开发战略与具体开发政策,决定对不同类型欠发达地区实施开发的切入点与展开次序:经济开发的层次、经济开发展开的进程与方法。即使同为欠发达地区,由于资源禀赋、技术组合以及社会制度与文化之间的差异,也会造成它们各自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类型与外在制约因素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针对这些差异,必须制定符合它们各自特点的开发战略,才能真正有效地使其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才能不断地突破资源稀缺性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也才能创造出适合这些新技术发挥作用的新制度,并为保障可持续的发展构建

① [美]吉利斯、波金斯、罗默、斯诺德格拉斯:《发展经济学》,彭刚、杨瑞龙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② [美]迈克尔·托达罗:《发展的含义》,载郭熙保主编《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培育和激励不断创新的制度结构。开发政策贯彻开发战略的宏观构架,落实在具体的资源开发、行业发展、市场培育以及相应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之中,从不同的角度、经济结构的某个方面,具体而微地实现阶段性的开发目标,保障开发进程的连续性。

经济开发的基本内涵决定了经济开发思想研究的基本内容。所谓经济开发思想就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因发达与欠发达的二元区分,针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开发,围绕开发目标、开发战略、开发途径、开发政策以及具体开发行为等所形成的认识、主张和观点。主要应该包括:(1)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基本状况及其资源有用性和开发价值的认知;(2)对开发战略选择与具体政策制定的观点与主张;(3)对经济开发主体的角色及其职能的认识与主张;(4)对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经验及不同区域开发经验的比较研究。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两大主题

梁启超在论及“近世之学术”时说:“吾论次中国学术史,见夫明末之可以变为清初,清初之可以变为乾、嘉,乾、嘉可以变为今日,而叹时势之影响于人心者正巨且剧也,而又信乎人事与时势迭相左右也。”^①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学术思想的嬗递与时代变迁的关系,故而在论及清代学术时,他又旗帜鲜明地使用了“时代思潮”的概念,来标明思想萌动、发展、演变与时代大局的关系。他说:“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寢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②由此可见,时局的变动与时代要求乃是一切思想及思潮形成的基本动力与反映的基本内容。因而研究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必得先对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及其基本思想方向有一个大致的把握。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② 同上书,第131页。

“变”与“求变”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大特点。中国近代社会之变实由内外之因交相为用，迭相加深。内因之变较外因为早，发端于乾嘉之际。大约1765年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吏治问题已经非常突出，朝廷重臣与地方督抚相互勾结，贿赂公行；地方官很少关心民生，胥吏横行，残害百姓，逼人家破人亡。^①“康乾盛世”的局面至此已经中衰，此后更是急转直下。至道光年间，随着外力的加入，打开国门，近代社会的大变局之象已经凸现出来。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1844年黄钧宰即提出：“初不知洋人何状，英、法国何方也。乃自中华西北、环海而至东南，梯琛航賸，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冯桂芬于1861年再次明确提出了“变局”论，说：“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③此后“变局”论成为普遍之识。

然而，此种变局的根本要点在于西方列强欲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对此，李鸿章痛心指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④这种情形在近代中国愈演愈烈。中日甲午一战，日本以蕞尔小国战胜了清王朝，帝国主义遂在中国掀起了瓜分狂潮。中国处在帝国主义的夹缝中，“犹以一羊处群虎之交”^⑤，随时都有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隐患。庚子之变后，虽然西方列强改变了对华侵略的策略，但却引发了一个更具野心的侵略者——日本的侵华胃口。从20世纪初开始，日本首先发动了日俄战争，取得了在东北的权益；随后插手辛亥革命，并在以后直接染指中国内部权争；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不断实施妄图分裂和肢解中国的阴谋活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不久，接踵而至的是‘九一八’事变，各种内外危机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甲午战争以来最严峻

① 刘广京：《中华民国史稿·刘序》，载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

② 黄钧宰：《金壶七墨》，载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第2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4年版，第623—624页。

③ 冯桂芬：《筹国用议》，载《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

④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载《李鸿章全集》第1册，海南出版社1986年版，第828页。

⑤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载《知新报》第66册，1898年9月10日。